汉语中俄源词的演变

——基于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的俄源词历史演变研究

申春雨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俄源词作为汉语词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演变轨迹深刻映射出中俄语言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与当代特征。本文以语言接触理论为分析框架,以外来词借用等级理论为切入点,选取《外来语词典》(1936,胡行之)、《汉语外来语词典》(1990,岑麒祥)和《新华外来语词典》(2019,史有为)三部具有时代代表性的词典为研究样本,从语用借用等级与语义借用等级两个维度,系统描写汉语中俄源词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借用特征。通过对收词量、收词领域、汉化方式及跨文化释义差异的量化对比与质性分析,揭示俄源词在政治语境主导、社会文化变迁、语言规范需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演变规律。这一研究揭示出俄源词从历史积淀到现代转型的轨迹,可为外来词的规范与词典编纂提供启示。

关键词: 俄源词; 收词范围; 汉化方式; 俄源词活力

中图分类号: H353.5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语言接触最先在词汇系统中显现,也最容易在词汇系统中留下印记。(王秋实,邹德文2023:75)针对"哪些词汇最容易被借贷"这一问题,有学者提出了"借用等级"。"借用等级"是指语言接触过程中施惠语输入到受惠语中的语言体系具有层次性质。(吕文涛2021:24)本文以语言接触理论为理论基础,以外来词借用等级为理论切入点,从语用借用等级、语义借用等级两个维度描写汉语中俄源词的借用等级。

词典作为系统记录和规范语言的重要工具,在外来词研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雨果所说,词典既是活生生的人,也是家喻户晓的神。(В.В. Дубичинский 2008: 29) 迄今为止,国内共出版外来词词典 9 部,按出版时间划分为三个阶段:20 世纪三四十年代(1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4部),21 世纪(4部)。笔者综合词典规模、编纂时间跨度等情况,从以上三个阶段各选一部作为样本语料,对比分析其收词、汉化方式和释义,探讨汉语中俄源词在不同时期的特点。

2 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的俄源词词条计量统计

《外来语词典》(1936,胡行之,以下简称《外典》)、《汉语外来语词典》(1990,岑麒祥,以下简称《汉外》)和《新华外来词词典》(2019,史有为,以下简称《新外》)中均收录了俄源词,但却存在诸多差异。以下从收词情况、汉化方式、释义三方面对其俄源词进行计量统计。

2.1 收词情况

词典编纂的首要任务是收词。收词是决定一部词典质量的第一个关键。(康萍 2013: 76)以下将从收词量及收词范围出发,对比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的俄源词收录情况。

(1) 收词量

收词量是衡量一部词典的重要标准,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的总收词量和俄源词收词量差 异较大,以下从收词量差异及其原因两方面进行阐述。

《外典》收录俄源词 30 条,占词典总词条数的 1.10%;《汉外》收录俄源词 146 条,占词典总词条数的 3.39%;《新外》收录俄源词 501 条,占词典总词条数的 8.43%。《新外》的俄源词收词量是《外典》的 10 倍以上,是《汉外》的 3 倍以上;《新外》的俄源词占比是《外典》的 8 倍以上,是《汉外》的两倍以上。

(2) 收词范围

汉俄语言接触史源远流长,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俄源词占据主流地位。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编纂时代背景不同,收词范围也不同。以下具体描述其收词范围差异。

笔者对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收词领域进行了统计归纳,详见下表。

表 1 《外典》《汉外》《新外》中俄源词收词领域分布表

领域	《外典》数量	《汉外》数量	《新外》数量	《外典》比重	《汉外》比重	《新外》比重
政治	11	16	32	36.67%	10.96%	6.39%
经济	7	/	/	23.33%	/	/
文学	6	/	/	20.00%	/	/
外交	2	/	/	6.67%	/	/
社会	2	/	1	6.67%	/	0.20%
伦理	1	/	/	3.33%	/	/
人的身份	1	/	17	3.33%	/	3.39%
现实人名	/	51	/	/	34.93%	/
文学人物	/	21	/	/	14.39%	/
地理	/	30	6	/	20.55%	1.19%
生活	/	6	93	/	4.11%	18.56%
典故俗俚	/	4	/	/	2.74%	/
工业	/	4	37	/	2.74%	7.39%
军事	/	2	18	/	1.37%	3.59%
音乐舞蹈	/	2	135	/	1.37%	26.94%
宗教	/	2	4	/	1.37%	0.80%
建筑	/	1	1	/	0.68%	0.20%
教育	/	1	/	/	0.68%	/
天文	/	1	/	/	0.68%	/
材料	/	/	28	/	/	5.59%
动植物	/	/	27	/	/	5.39%
医药	/	/	25	/	/	4.99%
文化艺术	/	/	21	/	/	4.19%
体育	/	/	7	/	/	1.40%
自然现象	/	/	3	/	/	0.60%
化学	/	/	2	/	/	0.40%

其他	/	5	44	/	3.43%	8.79%
总计	30	146	501	100%	100%	100%

由上表可知,《外典》收录政治、经济、文学 3 类词条 24 条,占比 80%,即《外典》 俄源词的收词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学领域,这 3 类词条涉及领域是该词典的主要描述范围, 在借用等级中处于优先地位;《外典》收录外交、社会、伦理、人的身份等词条 6 条,占比 20%,这 4 个领域的俄源词是其次要描述范围,在借用等级中处于不利地位。

《汉外》收录现实人名、文学人物、地理及政治 4 类词条 118 条,占比 80.83%,即《汉外》俄源词收词集中在人名地名、政治术语领域,这 4 类词条涉及领域是该词典主要描述范围,在借用等级中处于优先地位。《汉外》收录其余 10 类词条(生活、工业等)28 条,占比 19.17%,这 10 类词条涉及领域为该词典的次要描述范围,在借用等级中处于不利地位。

《新外》的俄源词涉及领域更多。《新外》收录音乐舞蹈、生活等 7 类词条 377 条,占比 75.25%,这 7 类词条涉及领域是该词典的主要描述范围,在借用等级中处于优先地位。《新外》收录其余 11 类(文学艺术、军事等)词条 124 条,占比 24.75%,这 11 类词条涉及领域为该词典的次要描述范围,在借用等级中处于不利地位。

2.2 汉化方式

各领域俄源词进入汉语首先要与汉语融合。杨振兰认为,汉语在吸收外来词的过程中所进行的这种改造,一般称之为汉化。(杨振兰 1996: 236) 史有为提出,汉语对外族词在形式上的改造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手段实现:音节改造,音节意化,音节减缩,原文意译,文字意化。(史有为 1991: 24) 苟芳琴对其作了进一步归纳:外来词表达的是外民族的概念,外民族概念一般以两种不同的形式进入汉语系统:一是音译,二是意译。(苟芳琴 2004: 145)以下从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汉化方式进行计量统计。

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中俄源词的汉化方式有音译、"音译+义标词"、"音译+意译"、意译、"首字母缩略+数字"等5类,详见以下图表。

		1X 2 (1) 1 X / (1)	(X)	苏州伏九刀八双里 农	
,	种类	《外典》数量	《汉外》数量	《新外》数量	例词
	音译	11	120	299	莫罗勘
	音译+义标词	7	10	189	康康舞
	音译+意译	1	10	12	客里空
	意译	11	6	0	熊的效劳
	首字母缩略+数字	0	0	1	AK47

表 2 《外典》《汉外》《新外》中俄源词汉化方式数量表

表 3	《外典》	《沙口外》	《新外》	中俄源词汉化方式比例表
AX J	(7) 44	N 1 X 7 I 1 //	₩7571771 7/	T 112.05 MILE 11.77 JULI 17.14X

种类	《外典》比例	《汉外》比例	《新外》比例	例词
音译	36.67%	82.19%	59.68%	莫罗勘
音译+义标词	23.33%	6.85%	37.72%	康康舞
音译+意译	3.33%	6.85%	2.40%	客里空
意译	36.67%	4.11%	0	熊的效劳
首字母缩略+数字	0	0	0.20%	AK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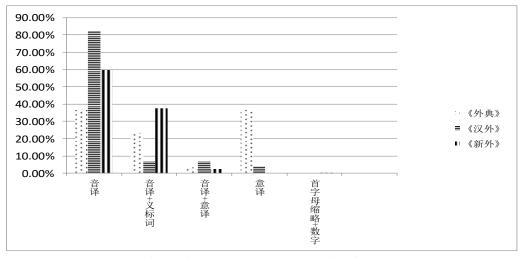


图 1 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俄源词汉化方式对比图(数据来源:根据表 3 统计)

统计可得,《外典》《汉外》收词以音译词、意译词为主,《外典》中音译词和意译词占比 73.34%,《汉外》中音译词和意译词占比 86.3%。《新外》则以音译词和"音译+义标词"为主,共占比 97.4%;此外,《新外》还增录了"首字母缩略+数字"类词条。

2.3 俄源词的跨文化对比与释义

释义是词典的核心,是词典编纂的中心工作。(陈晟 2021: 162) 俄源词带有俄罗斯本土文化色彩。溯源俄源词在俄语中的含义、明晰俄源词进入汉语后的意义变化,对于俄源词释义演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以下从跨文化释义差异及汉语外来词词典释义历时演变两个维度进行阐述。

(1) 中俄词典的跨文化释义差异

外来词进入汉语这个符号系统后,由于特定符号系统及其使用者的交际情境制约,必然使其在语义的性质、内容和数量等方面发生相应的调整。(李艳,施春红 2010: 60)以下对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的俄源词释义与奥热果夫《俄语详解词典》(С.И. Ожегов, Н.Ю. Шведова 2006)释义进行对比,并明晰其中差异。

笔者主要对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与奥热果夫《俄语详解词典》(以下简称《奥典》)收录的共同词条进行释义对比,研究发现,两者释义存在显著差异,详情如下。

	表 4 《	外典》与《奥典》语	义变化情况表			
共有词条	《奥典》多义词条	《外典》多义词条	语义缩小词条	语义缩小词条占比		
16	16	3	13	81.25%		
	表 5 《	汉外》与《奥典》语	义变化情况表			
共有词条	《奥典》多义词条	《汉外》多义词条	语义缩小词条	语义缩小词条占比		
24	10	0	10	41.67%		
表 6 《新外》与《奥典》语义变化情况表						
共有词条	《奥典》多义词条	《新外》多义词条	语义缩小词条	语义缩小词条占比		
163	86	6	80	49.08%		

统计显示,《外典》和《奥典》收录的 16 条共有词条中,81.25%的俄语多义词在汉语中只借用了某个义项(见表 3)。《汉外》和《奥典》收录的 24 条共有词条中,41.67%的俄语多义词在汉语中只借用了某个义项(见表 4)。《新外》和《奥典》收录的 163 条共有词条

中,49.08%的俄语多义词在汉语中只借用了某个义项(见表 5)。这种语义缩小现象本质上是汉语认知系统对俄语复杂语义的选择性过滤,体现了汉语系统的保守性。(刘国枝 2003:4)。由此可见,俄源词在进入汉语时存在语义缩小现象。

- (2) 汉语外来词词典释义的精细度与科学性差异
- 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释义各有侧重,特点鲜明。

2020 年,王恩旭、郭智辉通过梳理我国辞书释义方法的历史演变,指出词典的释义已经走过了粗粒度的、笼统释义的阶段,正朝着精细化、科学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王恩旭,郭智辉 2020: 2—5)以下从这三个方向阐述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的释义差异。

首先,《新外》释义更精细化。如"卢布"(рубль)一词,《新外》根据俄罗斯历史时期划分给出三个义项,而《汉外》和《外典》中"卢布"一词只给出一个义项,且《外典》仅指明其货币属性,释义更加粗略。其次,《新外》释义更科学化。如《新外》对"伏特加"(водка)释义时不仅指明其类别,并且指出其成分。而《汉外》对该词释义朴素,未指明其成分。最后,《新外》释义更系统化。如《新外》对"拉普"(Лапп)释义时不仅指出其全称,并介绍其发展史,《汉外》对该词的释义相对片面,《外典》仅指明其全称。《新外》在释义中增加"参见词"一栏,这一中观结构将相关的词条释义串联起来,形成系统。

《汉外》和《新外》共有词条为26条,其中释义相同词条1条。《外典》与《汉外》《新外》共有词条为3条,释义均不相同。

3 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差异原因分析

统计可得,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在收词、汉化方式、释义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以下 从时代背景、技术条件、词典编纂等角度探寻其差异原因。

3.1 收词情况差异原因

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的收词量、收词范围差异原因如下。

(1) 收词量差异原因

首先,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编纂时期的政治背景不同。《外典》编纂时,国内时局动荡,中苏文化交流受限。《汉外》编纂时,中苏关系紧张,汉俄语言接触受阻;受政策影响,国内俄源词研究受到阻碍,《汉外》出版延期。《新外》编纂时,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深化,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合作频繁,我国俄源词研究如火如荼,俄源词输入环境更加活跃,《新外》更注重文化交流的实用性。

其次,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编纂的技术条件存在差异。《外典》和《汉外》编纂于上世纪,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尚未广泛应用,语料的收集和处理依赖于传统手工方式。《新外》编纂于 2008—2019 年间,计算机辅助编纂和大数据技术的普及大幅提高了语料处理能力,俄源词收词量扩大。

最后,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收词原则有所不同。《外典》既不收录"过专门者",亦不收录"过普通者"。《汉外》以收录具有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的词汇为主,倾向于收录经典、历史性词汇。《新外》遵循描述性原则,所收词包括常用外来词。因此,《新外》既保留历史性词条,又新增许多科技及生活领域词汇,收词量大。

(2) 收词范围差异原因

首先,编纂时期的社会背景不同。20世纪30年代,国内政局不稳,政治话题热度高。这一时期我国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以俄为师",效仿其政治制度。20世纪80年代,中苏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类俄源词在汉语中广泛应用。因此《汉外》中政治术语比例较高。此

外,中苏关系处于"全面对抗"阶段(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初),俄源词研究范围受限,《汉外》收词倾向于专有名词。

21 世纪,中俄交流深化,更多俄源词通过科技合作、文艺作品翻译和日常生活接触进入汉语。《新外》收录大量音乐舞蹈类词条,这反映了俄罗斯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力。进入新时期,我国日渐重视自然科学技术发展,注重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相关术语也随之借入汉语。因此《新外》中工业类、动植物类、材料类及医学类词条数量较多。

其次,词典编纂目标不同。《外典》采用普遍性原则,经济性原则和描写性原则,集"各种术语""普通语"于一体。(邹佳 2021: 22)《汉外》的编纂目的是"正本清源",对俄源词进行系统梳理,注重文化和历史价值。因此,收录大量人名、地名和政治术语,以展现中俄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伍铁平提出,既然是外来语词典,就应区别于专名词典和百科词典。地名、人名凡未转化为普通名词者,不宜收录。(伍铁平 1994: 103)《新外》不再收录人名、地名。《新外》注重通用词的实用性和时代性,其收词范围扩展到音乐舞蹈、生活、工业等领域,体现出对现代社会多元化需求的回应。

最后,语言接触途径影响词典的收词范围。来源于俄语的汉语外来词从引入的途径可以分为口语外来词和书面外来词。(殷燕 2014: 15) 通常,书面语外来词先被引进,继而流入口语。《汉外》和《外典》中俄源词主要通过书面语传入,因而政治类和文学类词条占比较大。口语外来词先在口语中流传,继而表现在文字中。《新外》编纂时期,更多生活和文化艺术领域的俄源词通过口语进入汉语,口头传播为其广泛应用提供了可能。

3.2 汉化方式差异原因

首先,相对《汉外》和《新外》中音译词占比下降、"音译+义标词"上升,是因为《新外》编纂时,汉语对外来词的规范化要求更高,因此更多采用兼具音译和意译表达的汉化方式。此外,外来词进入汉语之初形式不一,通常情况下是汉化程度高的形式被最广泛地接受。(颜红菊 2002: 75)汉化方式不同的外来词汉化程度不同,音译词接受度不如"音译+义标词"。而《外典》编纂时期,国内环境动荡,外来词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汉化处理方式不够科学,以单一的音译或者意译为主。

其次,增录"首字母缩略+数字"构成的俄源词则受到新时代人们求新求异心理的影响。 汉语使用者有望文生义的心理倾向,更倾向于接受"音译+义标词"这种具有标识性和解释 性的形式。

3.3 释义差异原因

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和俄罗斯的俄语词典释义存在较大差异,即跨文化释义差异较大; 而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释义呈历时演变趋势,渐趋精细化、科学化、系统化。以下具体阐述 跨文化释义差异原因及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释义演变原因。

(1) 跨文化释义差异原因

首先,认知系统、文化系统及交际需要影响外来词义项的取舍。外来词进入汉语时具有选择性,而这种选择性则受认知习惯及由此而形成的认知系统、文化系统的制约。(李艳,施春红 2010: 61)不同语言的语义关系并不是完全对应的。此外,交际需要也是外来词义项保留的重要原因。

其次,汉语系统是否引进外来词的部分义项与实际需求有关。为维护自身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汉语对外来词的引进总体上呈现保守倾向。汉语引进外来词时,通常会根据实际需求删除部分义项或剔除部分文化因子,因而其文化内涵发生改变。

(2) 释义变化原因

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释义方法的变化和语言的变化影响了词典释义的变化。

① 释义方法变化

首先,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受到不同语言政策的影响。《外典》编纂时期,国内语言研究偏重汉语本身,对外来词研究尚不充分;《汉外》编纂受到汉语规范的影响,采用更规范的释义方法。党的十八大后,我国要求语言管理服务国家战略。(滕延江,王立非 2024:52)新语言政策注重实用性、简明性。因此《新外》更注重为汉语使用者提供明确、详尽的信息,满足当代社会对外来词精确释义的需求。

其次,词典编纂向科学化与系统化发展。随着辞书学理论的进步,释义方法逐渐从粗粒度向精细化、科学化方向演变。《新外》通过增加历史背景、参见词条等结构,增强了释义的系统性。

② 语言变化

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编纂时期不同。语言是不断变化的,俄源词也不例外。部分俄源词在使用中会出现语义扩大现象。如"杜马"(Дума)一词,在《新外》中新增了"俄罗斯联邦议会"这一义项,但《外典》并未收录该词。《外典》编纂于20世纪30年代,《汉外》编纂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资料和方法有限。《新外》编纂时期,计算机辅助编纂和大数据技术已普及,编者可参考更丰富的语料和文献资料,对释义进行精细化补充。

综上所述,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中俄源词的差异及其原因是多层次的,这不仅反映了语言接触的时代特征,也体现了词典编纂理念的进步和外来词在汉语中的适应性发展。

4 汉语中俄源词的历时演变特点

俄源词在汉语中的适应性发展有其自身特点。笔者通过对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中俄源词条的数量统计、释义变迁以及例证分析,力求挖掘出俄源词在汉语系统中的内在发展规律,进而归纳总结出俄源词在汉语系统中的如下发展特点。

4.1 俄源词在汉语中应用领域广

由表 1 可知,俄源词在汉语中广泛应用于政治、文化、生活等领域。而且俄源词不仅被应用于书面语,如"苏维埃"(Совет)、"布尔什维克"(Большевик)等;也被应用于口语,如"列巴"(хлеб)、"哈拉少"(хорошо)等。

4.2 俄源词汉化方式趋于多元化

社会文化观念影响着词语意义或形式的变化,社会群体的文化性格影响着词语的产生和流行。(黄春蕊 2013: 114)俄源词进入汉语的首要步骤是汉化,俄源词的汉化方式也从纯音译、意译衍生出"音译+义标词"和"音译+意译"等,这些汉化程度高的方式广受欢迎。

4.3 俄源词活力不断变化

词典收词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词汇活力的动态变化。由表 1 可知,经济类词条和人名地名在汉语中失去活力。音乐舞蹈类、生活类、工业类、材料类、动植物及医学类等俄源词在汉语中活力增强。政治类俄源词活力则是先下降,然后趋于稳定。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收词范围差异大,说明汉俄语言接触交流的领域在不断扩大。

综上所述,俄源词在汉语环境中呈现多元化特点,有较强的生命力,并影响着汉语词汇。

5 结语

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编纂的时代背景不同,对比分析其俄源词,对研究俄源词以及我国外来词词典编纂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新外》的俄源词收词量几乎是《汉外》的四倍,《外典》的十余倍;《新外》中的俄源词收词范围更广,更能体现现代汉俄语交流全

貌;《新外》中的俄源词在汉化时纯音译的词更少,汉化方式更科学,接受度更高;《新外》 的释义更精细化、科学化、系统化。

本研究以三部汉语外来词词典为语料样本,对比三个时期的俄源词,探究俄源词在汉语系统中的演变特点,有助于预测俄源词未来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汉语词汇系统的影响。明晰外来词演变规律,关注国际关系,兼顾当代语言政策及交际需求,才能编纂出服务于时代的实用型外来词词典。

参考文献

- [1] Дубичинский В.В.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М].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Флинта, 2008.
- [2] Ожегов С.И., Шведова Н.Ю.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Z]. Москва: А ТЕМП, 2006.
- [3]胡行之. 汉语外来语词典[Z]. 上海: 天马书店, 1936.
- [4] 岑麒祥. 汉语外来语词典[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5]史有为. 新华外来词词典[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 [6]王秋实, 邹德文. 汉语东北方言词汇系统中的俄语影响[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23(7).
- [7]吕文涛. 语言接触视阈下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21.
- [8]康 萍. 浅论《大辞海·美术卷》的收词[J]. 辞书研究, 2013(5).
- [9]杨振兰. 现代汉语词彩学[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6.
- [10]史有为. 外来词:两种语言文化的融合[J]. 汉语学习, 1991(6).
- [11] 苟芳琴. 汉语外来词的产生原因、范围类型及其规范[J]. 社科纵横, 2004(3).
- [12]陈 晟. 方言词典释义应注重百科性和理据性[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2).
- [13]李 艳, 施春宏. 外来词语义的汉语化机制及深度汉语化问题[J]. 汉语学习, 2010(6).
- [14]刘国枝. 汉语对外来词的语义改造[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5).
- [15]王思旭, 郭智辉. 辞书释义方法的演变研究[J].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6).
- [16]邹 佳. 胡行之及其《外来语词典》研究[D]. 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1.
- [17]伍铁平. 简评岑麒祥著《汉语外来语词典》[J].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 1994(6).
- [18]殷 燕. 源于俄语的汉语外来词研究[D]. 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 [19]颜红菊. 外来词反汉化选择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析[J]. 邵阳学院学报, 2002(S2).
- [20] 滕延江, 王立非. 我国语言管理思想的历时演进[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4(1).
- [21]黄春蕊. 汉语新词中俄源外来词本土化倾向研究[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4).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Russian-Origin Loanwords

— 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Russian-Origin Loanwords Based on Three Dictionaries

Shen Chun-yu

(Center of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As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the Chinese lexical system, Russian-origin loanwords reflect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and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of Sino-Russian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Employing language contact theory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the theory of borrowing hierarchy as the entry point,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delineates the borrowing characteristics of Russian-origin loanwords across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is is achieved through a dual-dimensional analysis (pragmatic borrowing hierarchy and semantic borrowing hierarchy) using three lexicographical dictionaries as research corpora: *Dictionary of Loanwords* (1936, Hu Xingzhi), *Dictionary of Chinese Loanwords* (1990, Cen Qixiang), and *Xinhua Dictionary of Loanwords* (2019, Shi Youwei). Quantitative comparison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lexical inclusion volume, semantic domains, nativization strategies, and cross-cultural definition variations reveal the evolutionary patterns of Russian loanword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the predominance of political context, sociocultural shifts, and linguistic standardization needs. Furthermore, the study explores their impact on the Chinese lexical system. This research elucidates the trajectory of Russian-origin loanwords from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to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fering insights for loanword standardization and lexicographical practices.

Keywords: Russian-origin loanwords; lexical inclusion scope; nativization strategies; vitality of Russian loanwords

作者简介: 申春雨(2001—),河南省滑县人,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术语学。

收稿日期: 2025-01-09 [责任编辑: 惠秀梅]